

特稿

透视红军长征中战术运用之道

■李书吾

引言
作为人类军事史上的战争奇迹,红军长征在极端险恶的战场环境中,展现出了成熟的战术决策智慧。长征中,红军的每一次行军、每一场战斗,本质上都是在多重矛盾作用下的战术运用。在敌强我弱、补给匮乏、环境恶劣的条件下,红军在攻与守、快与慢、主与次、虚与实等军事矛盾中把握平衡,以灵活的战术运用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梳理、把握这些战术运用的内在逻辑,既是解码长征军事奇迹的切入口,也能为打好现代战争提供有益启迪。

攻与守的运用:以战略目标为锚的军事智慧

在军事行动的基本范畴中,攻与守是一对最为常见的矛盾体,但无论攻守如何转换,二者都是服务于战略意图的手段,其价值判断始终取决于能否达成核心战略目标。长征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红军把握住了攻守运用的正确规律,摒弃了单纯僵化的进攻或防御选择,在战略需求的变化中不断切换攻守状态。

长征中,红军以机动战为战术基本形态,通过战术防御争取转移空间,通过战术进攻打开生存通道,实现了攻守的灵活转换。比如,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时而以防御姿态阻击追兵,在机动中规避敌军主力锋芒,时而以进攻姿态调动敌人,瞄准敌军的薄弱环节主动出击,攻守形态随战场态势及时切换,始终让国民党军处于被动应付状态,最终成功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在腊子口战役中,面对北上通道的天险与重兵防守,红军以正面进攻结合侧翼迂回的战术实施攻坚,以局部攻势保障战略转移的整体大局。而对于无显著战略价值的阵地,红军坚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原则,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让进攻和防御的重心始终聚焦于保存有生力量这一目标,在攻守的动态平衡中牢牢掌握作战主动权。

红军长征中攻守运用所体现的辩证逻辑与军事智慧,在当前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也同样适用。随着各类新兴技术、新型战法的不 断应用,战场攻守转换的界线日益模糊,节奏不断加快、维度极大拓展。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对抗中动态把握攻守平衡,才能在多域战场中始终保持战略主动。在防御维度,要从固守物理空间转向守护体系核心节点,以分布式机动防御替代静态阵地防御,依托信息优势实现防御要素的动态聚合,避免陷入消耗性的阵地对抗;在进攻维度,要从兵力毁伤转向

体系破击,以精确打击直击敌方作战体系软肋,力求达成“毁其一点,破其全局”的作战效果。

快与慢的运用:以作战节奏为纲的张弛有度

红军长征中的快慢运用主要体现在军事行动速度服务于作战需要、把握作战节奏上:快是为了摆脱围追堵截、抢占战略要地、创造有利态势;慢是为了恢复战士体力、筹措粮秣给养、扩充红军数量。在这个过程中,快慢本身没有绝对优劣之分,只有根据战场态势实现快慢相济、张弛有度,才能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保持部队的战斗力韧性,从而确保始终“致人而不致于人”。

在红军飞夺泸定桥中,红四团需要在紧迫的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他们昼夜兼程 240 里,最终赶在敌军增援部队之前抵达大渡河西岸,以极快的速度抢占了战场先机。在巧渡金沙江时,红军快速穿插,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战略转移中的关键跨越。而当暂时摆脱敌军追击、处于相对安全的区域时,红军会主动放慢节奏进行系统性休整。比如,在遵义期间,红军进行了多天休整,完成了军事指挥体系的调整,还广泛开展筹粮与群众宣传,补充新兵,为后续军事行动积蓄了人力与物力。

这种张弛有度的节奏,在现代战争中依然具有实践价值。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固然呈现出“快速决策、快速打击、快速结束”的特征,但速度优势必须建立在可控的节奏之上。一味追求极速反而可能透支战争潜力、陷入战略冒进。我们可以借鉴红军长征中的快慢运用之道,进一步深化对现代战争节奏调控的认 知与把握,构建“快打击+慢蓄力”的双重节奏体系。在战术层面,可依托高速打击武器、快速反应部队与智能化指挥系统,实现临机快速响应,以速度争取赢得战场先机;在战略层面,要重视作战体系设计与后勤保障布局,以耐心的战略布

局积蓄长期优势。同时要基于全域态势感知精准调控节奏,根据战场态势在快与慢之间无缝切换,避免因慢失机,也防止因快失稳,始终将把握作战节奏的主动权掌控在自己手中。

主与次的运用:以力量分配为核的战术协同

在复杂的军事实践中,主要矛盾决定行动的根本方向,次要矛盾影响全局的发展进程。要达成理想的作战效果,必须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如果主次颠倒,就可能分散兵力、迷失方向,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如果只重主要矛盾、不顾次要矛盾,也可能因小失大,让次要环节的漏洞侵蚀全局优势。正是基于对这一规律的清醒认知,红军在战场动态演进中把握主次关系,对各类资源进行科学分配,形成了主次协同的作战部署,实现了有限军事力量的高效运用。

在作战实践中,红军始终锚定战略目标,集中力量于主要方向。例如,为夺取泸定桥,红军兵分两路,主力沿大渡河西岸直奔泸定桥,作为主要突击方向,集中精锐力量承担核心攻坚任务;另一部分兵力沿东岸前进,配合西岸主力行动,扫除敌军对西岸红军的侧翼威胁。这种主次分明的兵力部署,既保证了主攻方向的力量优势,又通过其他方向的配合分散了敌军注意力。强渡乌江时,红军面对“一道乌江系生死”的天险,没有全线平推,而是选定江界河渡口为主要突破方向,集中精锐突击队和有有限炮,形成局部优势。同时其他部队突破回龙场、茶山关等渡口,牵制敌军兵力与火力,多点撕开防线,最终突破乌江天险,为进占遵义、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

红军长征中的主次协同智慧,对现代体系作战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是多域联动的体系对抗,作战要素繁多、战场维度多元。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的精准性直接决定着作战效能的释放。为此,首先要坚持重点论,集中优势力量打击敌方作战体系的核心枢纽,以使关键节点瘫痪带动全局体系瓦解,避免平均用力、全线出击;其次要兼顾两点论,以其他方向的佯动、牵制与配合,为主攻方向创造有利条件;最后要把握主次转化的动态性,随着战争演进及时调整战略重心,在多域战场中灵活切换主要作战域与次要作战域,始终以资源的最优配置服务于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90 周年

核心战略目标。

虚与实的运用:以战略主动为要的以谋制胜

虚与实是军事谋略的两个重要方面,虚是示形、佯动、战术欺骗,实是兵力、行动、真实意图。长征中的虚实运用,就是通过虚实结合调动敌人、摆脱被动、掌握主动。需要注意的是,虚不能脱离实而独立存在,没有实力支撑的虚张声势极有可能被敌军轻易识破;实也不能脱离虚的掩护,没有伪装的真实意图会让敌军提前作好防备。彼时,红军在总体兵力、火力均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之所以能屡屡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关键就在于指挥员深谙虚实相生的辩证之道。

四渡赤水的作战历程,就是虚实相生战术的经典实践。红军三渡赤水后,故意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吸引国民党军向川南地区集结,随后四渡赤水折返向东,佯攻贵阳,迫使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这一系列战术动作,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围堵部署,为红军西进云南创造了宝贵的战略窗口。在之后的巧渡金沙江中,红军的作战行动同样起到了虚实结合的效果。在渡江之前,毛泽东经过实地勘察后,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附近渡江。这一决定使中央红军的渡江点增多,既可分散追敌,又增加了渡江成功的可能性。之后,红一军团继续“引敌人向西”,将大部分国民党军吸引至云谋方向。此时,蒋介石虽认定中央红军“渡金沙江无疑”,却始终弄不清中央红军究竟在哪里渡江,始终处于被动追赶的状态。最终,红军凭借着虚实相生、以谋制胜的军事智慧跳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虚实相生的谋略精髓,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成为掌握战场主动的重要方法。现代战争的虚实对抗,已经从传统的兵力佯动拓展到信息战、电磁战等多维度,各类战术复杂度大幅提升。做好现代战争的虚实相济,一方面要强化“以虚乱实”的谋略运用,依托电子欺骗、网络佯动等手段,多维度制造虚假态势,诱导敌方产生误判,掩盖己方真实作战意图;另一方面要坚持“以实击虚”的打击逻辑,在虚实掩护下精准识别敌方体系漏洞,集中力量实施突破。同时,要适应信息化智能化战场的快节奏,实现虚实战术的快速迭代与动态转换,从而让虚实之道在现代战争中更好发挥制胜效能。

群策集

2026 年 7 月,世界上发生了一场悄无声息的“数字越狱”——在国外一次内部网络的安全测试中,一款大模型为追求更高的测试评分,竟自主发现了一处此前未知的“零日漏洞”,突破了与互联网严格隔离的“沙箱”环境,并通过自主推理入侵了其他人工智能平台的数据库。整个过程中,该大模型的自动化操作可谓“行云流水”,不需要一句人类指令。面对人工智能可以绕过人类规则“自作主张”的现实,不禁引发我们的担忧:倘若人工智能的这种行 为发生在军事斗争领域,人类还能不能守住军事算法、军事科技,乃至战争洪流的安全“闸门”?

从深层次看,人工智能“自作主张”,本质是大模型目标推演与人类原始意图发生错位和悖逆。大模型不会像人类一样产生主观恶 意,但会在任务目标的指引下追求效能最大化,寻找人类未曾想到或不允许“通过”的实现路径。就军事领域而言,人工智能的这一特性至少存在三大风险:其一,陷入冲突失控危机,推高战争升级风险。若智能系统拥有过高自主权限,或者能自行突破规定边界,就可能脱离人的意志,使战事向着出人意料的方向发展。其二,冲击战争固有伦理,引发人道主义灾难。若智能化武器装备擅自发起攻击行动,而人类又来不及有效干预,就可能导致事态在极短时间内升级,甚至可能在战争伦理的约束之外造成杀伤,带来严重后果。其三,加剧对抗连锁反应,扩大军事博弈范围。如果人工智能被不加限制地应用到战场,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各对抗链的关联度,提高战争的节奏和烈度,各军事集团间的竞争、博弈也可能因此进一步加深,使战争更加难以控制。

事实证明,制约马匹行动的缰绳一旦脱离人手,驯化再好的良驹也可能“反噬”主人。面对人工智能给军事领域带来的风险挑战,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放任自流,而是要善于握紧人工智能的“缰绳”——人类的最终决策权。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创新变革,让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人类安全需要,而不能成为悬在人类头顶且随时可能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防范和遏制人工智能“自作主张”等风险,需要构筑技术、制度、责任多位一体的严密防线。在技术层面,应避免科技“黑箱”,让人工智能在“阳光”下运行,让算法的决策逻辑能够被看见、被看清、被追溯、被操控。同时,在智能系统中设置不可逾越的“红线代码”,一旦人工智能决策触碰这些红线,系统便可发出预警,或自动切换至人工模式。在制度层面,要尝试建立健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可以建立跨领域人工智能风险伦理审查制度,对进入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系统进行严格的安全评估和伦理审查。还可以构建系统监控

握紧人工智能的「缰绳」

机制,让人工智能的决策过程可控、可查、可纠,增强人对人工智能掌握的精细度。在责任层面,形成“人机共担”的新型战争责任观。人工智能无论多么先进,都只是辅助人类决策的工具,这就需要明确各层级人员在人工智能使用中的具体职责,建立清晰的责任追溯链条,一旦出现意外,能够迅速定位问题环节、追究相关责任。同时,要加强对军事人员的人工智能素养培训,使其既懂得如何有效运用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又能够在关键时果断断接管、纠正偏差,做到敢用、善用、能控。

总而言之,在军事领域,人工智能可以是锋利的剑,但不能是执剑的手;可以是精确瞄准靶心的眼睛,但不能是自主扣动扳机的手指。握紧人工智能的“缰绳”,不是为了束缚技术的翅膀,而是为了保证“飞翔”的安全。只有坚持以人为主、算法为辅,让人工智能沿着预设轨道服从和服务于军事需求,才能在新军事革命中行稳致远,有效守护和平与安全。

注重提升指挥员跨界素养

■朱林艳

挑灯看剑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作战形态逐步向体系对抗深度演进,单一领域的专业能力已难以支撑复杂战场条件下的指挥决策。在此背景下,指挥员跨界素养的提升,是适应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形态、驾驭多域联合作战的必然要求。为此,应在搭建跨域知识体系、强化体系思维能 力、拓展跨域实践场景等方面持续用力,推动指挥员由单一专业型向复合指挥型转变,使跨界素养真正成为撬动体系作战效能的重要支点。

搭建跨域知识体系。作战体系的多域融合实质上是不同技术、不同理念在不同作战域的交叉耦合,熟悉、理解、掌握这些技术、理念的相关知识,是提升指挥员跨界素养的前提。从这个角度讲,指挥员的跨域知识储备越扎实,就越能准确把握各域作战行动 的关联影响。同时,多域作战的复杂性要求指挥员的知识储备必须覆盖更宽的领域范围,形成完整的知识链条,从而能在复杂战场态势中把握主要矛盾、作出科学判断。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更好搭建跨域知识体系,以本军兵种指挥专业 知识为核心锚点,向外延伸至其他军兵种的关联知识,同步吸纳智能化、无人化等前沿技术原理,从而建立体系化的跨域知识框架。

强化体系思维能力。体系作战的运行逻辑是要素联动、效能涌现,各作战单元、作战域之间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关联。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体系化的思维模式,对于指挥员在多域并行的作战行动中实现统筹兼顾至关重要。因此,指挥员要善于从体系整体视角审视作战行动的影响,要学会运用系统分析法拆解作战体系的结构与运行机制,厘清各作战域的功能定位、衔接节点与协同界面,掌握体系效能生成的内在规律。同时,要将单一作战行动置于体系作战全局中进行谋划,兼顾各域作战需求与行动节奏,主动寻求不同作战域之间的效能互补,推动指挥模式从局部管控向体系运筹升级。

拓展跨域实践场景。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作战实践中,不同作战域的 话语体系、行动模式、决策逻辑存在天然差异,这些差异的呈现方式、处置对策高度复杂,仅具备相关知识和思维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持续拓展跨域实践场景,将跨界素养的提升建立在理论学 性要求指挥员的知识储备必须覆盖更宽的领域范围,形成完整的知识链条,从而能在复杂战场态势中把握主要矛盾、作出科学判断。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更好搭建跨域知识体系,以本军兵种指挥专业 知识为核心锚点,向外延伸至其他军兵种的关联知识,同步吸纳智能化、无人化等前沿技术原理,从而建立体系化的跨域知识框架。

谈兵论道

作战筹划是军事行动的前置环节,是统筹作战资源、规范作战流程、把 控作战节奏的系统性工程。当前,现代战争越来越呈现出态势瞬息万变、要素高度融合、对抗全域叠加、节奏极速迭代等鲜明特征,传统滞后式、被动式、经验式的筹划模式,已无法适配高强度、智能化、一体化的现代作战场景。而良好的前瞻性分析能够跳出即时态势的局限,提前规避作战风险,预置作战能力、形成作战计划。因此,必须构建系统化、科学化、精准化的前瞻性筹划体系,以长远视野、全局思维、底线思维绘制作战筹划“施工图”,为提升整体作战效能筑牢坚实基础。

立足全局态势研判。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全局与全局的博弈,战场空间不再局限于单一地域、单一维度,而是实现多域贯通、全域联动,各类作战要素、作战单元、作战力量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在这一背景下,做好作战筹划的前瞻性分析并非对当前战场态势的简单梳理和短期行动的机械排布,而是基于战略顶层定位、战场全域规律、敌我力量底层逻辑的深度研 判,进而预判态势演化趋势、识别格局变动方向、把握对抗核心矛盾。这就决定了,只有树立全局联动的认知思维,打破局部视野、即时思维的桎梏,才能精准锚定作战筹划的正确方向,实现局部行动与全局战略的高度统一。开展

刍议作战筹划的前瞻性分析

■张国栋

前瞻性全局态势筹划,可以建立标准化、常态化的全域态势研判机制。要搭建全域态势感知分析框架,整合各维度战场数据、敌我力量参数、战场环境要素,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态势数据库,摒弃碎片化、片面化的信息研判模式,为前瞻性分析提供完整的数据支撑。还可以建立态势演化推演模型,基于战场运行底层规律,梳理各类态势变量的关联逻辑,量化研判态势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区分核心趋势、次要变化、突发变量,精准把握战场态势变化特点。

聚焦风险前置防控。不确定性本就是战争的常态,尤其是战争形态进入信息化、智能化以来,战场环境的动态性、敌我博弈的对抗性、作战体系的复杂性显著加剧,各类潜在风险、突发变量和未知隐患更加多样。正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做好风险防控,提高作战行动的稳定性和容错率很大程度上依靠作战筹划的前瞻性分析。因此,必须将风险防控思维深度融入作战筹划全过程,把潜在隐患预判到位、风险边界划定清晰,应对预案前置完善,从而筑牢作战行动的安全底线。落实风险前瞻性管控,需要构建全维度、全链条的风险筹划与防控体系。一是开展全周期风险摸排梳理,围绕力量部署、物资保障、战场机动、指挥链路、体系协同等各作战环节,系统排查显性风险与隐性隐患,建立分类分级的风险清单,明确各类风险的触发条件、影响范围和破坏程度。二是建立风险阈值管控标准,结合作战任务等级、战场环境

条件、力量配置状况,划定各类风险的预警边界、可控范围和处置底线,实现风险识别的标准化、精准化。三是预置多元化应急处置方案,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潜在风险,制定适应性强、可快速落地的备用筹划方案,明确风险突发后的力量调整、任务变更、资源补位、节奏调控方式,构建“预判—预警—处置—复盘”的闭环风险防控机制,全面提升作战筹划的抗风险能力。

依托规律精准施策。作战筹划的前瞻性分析不是主观臆断、闭门造车的超前布局,而是基于对战争规律、作战逻辑、力量特性的科学预判与主动布局。从更深层次看,作战筹划的超前性,本质是对战争规律、对抗节奏、力量效能、环境影响的精准把握,只有吃透现代战争制胜机理,厘清各类作战要素的作用逻辑,才能精准预判战场发展趋势,让作战筹划贴合实战需求、适配战场变化。基于战争规律开展前瞻性筹划,需要构建科学化、专业化的筹划实施体系。首先要深耕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研究,常态化梳理体系作战、全域作战、精准作战的运行逻辑,总结不同作战场景、不同对抗态势下的作战规律,形成标准化的筹划理论支撑。其次要推行量化精准筹划模式,依托大数据、智能化分析手段,对作战力量效能、战场环境影响、对抗损耗比例、任务完成时效等核心要素进行量化分析,以数据规律支撑筹划决策,杜绝模糊化、经验化的粗放式筹划。再次要动态贴合规律优化筹划方案,根据战场规律的阶段

性变化、作战进程的推进特点、敌我对抗的态势演变,实时微调筹划细节、优化力量布局、调整作战节奏,让作战筹划始终适配战场规律,实现超前布局、精准施策、高效制胜。

着眼长效迭代升级。作战筹划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方案,而是适配战场发展、任务迭代、力量更新的动态体系。长效迭代、持续优化是保持筹划前瞻性的 重要抓手。面对现代战争技术装备、作战理念、对抗模式、战场形态的持续更新,作战筹划要摒弃静态固化、一劳永逸的筹划思维,着眼于作战体系的长效发展、作战能力的持续提升、作战模式的迭代优化,统筹当下筹划与长远建设、短期任务与长效优势,实现作战筹划从“适配当下”向“引领未来”的进阶升级。为此,一方面要建立作战筹划复盘迭代制度,针对各类作战筹划的实施过程、适配程度、存在短板进行系统性复盘,梳理筹划设计中的漏洞偏差,适配短板和优化空间,形成迭代改进清单,为后续筹划优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要对接新型作战要素更新筹划体系,紧跟军事技术发展、新型装备列装、作战理念升级、编制体制调整的节奏,及时更新筹划框架、优化筹划标准、完善筹划要素,让作战筹划适配新型作战体系建设需求。同时构建梯度化前瞻布局模式,区分短期作战任务、中期态势调控、长期战略发展三个维度,分层开展筹划设计,在完成当下作战任务筹划的基础上,提前布局中长期作战能力建设、战场优势培育、作战模式创新、持续积蓄作战势能,实现作战筹划的持续更新。